

二十一世紀 中國基督教的前景

劉澎



一、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性機遇

基督教在今日中國不是社會的主流，也不是政府認可與欣賞的社會積極因素，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文化的排斥。那麼，「基督教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有沒有前途？有甚麼樣的前景？」應該說，從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與中國社會的現實來看，基督教在中國有著極為美好的前途和極為難得的、空前的歷史機遇。然而，中國基督教能否抓住這個機遇，還取決於基督教是否能夠看見上帝給予基督教的這個機遇，是否對自身狀況與社會環境有正確的認識，能否有正確的應對戰略與策略。

1. 信仰危機

目前中國社會中最受大眾關注和最需要解決的而執政黨、政府和任何其他組織、其他力量又無法解決的問題是甚麼？就是信仰與道德危機。目前的中國是經濟空前繁榮、環境空前惡化、精神空前貧困、思想空前混亂、信仰空前缺失、道德空前墮落。信仰與道德危機普遍存在於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其後果影響

及於每一個中國人，是當今中國社會與中華民族的最大危機。由於沒有信仰、沒有道德、沒有誠信，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身心疲憊、痛苦不堪，都是信仰缺失、道德墮落的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不僅沒有為中國人帶來和諧、穩定與幸福，反而暴露了各種矛盾，將人性中的各種醜陋、社會中的各種罪惡、體制與制度上的各種弊端放大到了極致，整個社會瀰漫著日益強烈的失望與不滿。

2. 官方意識型態失效

導致中國社會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建國以來作為官方正統意識型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喪失了其作為信仰理念體系的效用。中共雖然擁有8,000萬黨員，但卻不再是一個由信仰與理念為支撐的信仰團體，不再是一個由具有崇高理想與遠大目標的馬克思主義忠實信徒組成的理想主義者的組織。共產黨員為了實現信仰所必須的徹底犧牲與獻身精神，早已蕩然無存了，中共內部真正相信並願實踐馬克思主義的人已是鳳毛麟角(任何一級黨

委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的測試)。儘管中共是執政黨，掌握著龐大的國家機器，但卻一步一步地喪失了道義的制高點，喪失了精神信仰上的原動力，喪失了思想理念上的征服力。曾經指導億萬中國人的意識型態已功利化了，不再是中國人心中的燈塔、中國人所嚮往；昔日的精神支柱本身已經虛假化、空洞化了。作為一個代表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官僚化組織，中共雖然提出了「三個代表」(註)、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但卻無法實踐這些理論，這些理論的最新版的浪漫化表述是「中國夢」，但「夢」能否成為現實，沒有人知道。事實上，執政黨正日益蛻變為一個以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為指導的利益集團。面對今日中國社會的種種亂像，特別是信仰缺失，中共無計可施，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

3. 社會道德基礎蕩然無存

這是中國歷史上未有過的現象。兩千年來封建社會改朝換代但不換信仰，清王朝被推翻後帶來信仰演變。解放後，毛澤東徹底摧毀中國傳統文化與信仰基礎，大搞造神運動，個人崇拜。毛死後，鄧小平用金錢拜物教代替毛澤東的個人迷信，致使人人向錢看，全社會人欲橫流、喪失一切道德底線。

二、執政黨挽救信仰的努力

共黨一方面繼續強化對正統意識型態的宣傳，強化「主旋律」的指導作用，一方面試圖利用其他宗教、信仰，但迄今為止，所有努力都沒有效果。腐敗蔓延，官員與富人大量移民外逃。在官方意識型態失效的情況下，中國是否可用其他信仰作為精神支柱呢？這就需要對中國國內各種現存的宗教及信仰進行具體分析。

1. 「儒教」風光不在

由於看到了官方意識型態的墮落、蛻變和馬克思主義的無效性，有人試圖搬出儒家思想，希望

向傳統要資源，以此代替昔日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今日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支柱。但產生在封建時代農耕社會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為最高統治者利益服務，難以適應自由、民主、平等與法治暢行的當代社會中人的需要。此外，從精神信仰的角度上說，儒家思想雖然包含著豐富的道德與哲學，提倡教化，但卻不講靈魂，不信超驗，不談來世，不涉及人的終極關懷，不是嚴格的宗教學意義上的宗教。儒家思想作為人類文明遺產的一部分，應該繼承其精華，一些學者也為此在努力，他們被稱為「新儒家」，但要把儒家思想作為今日中國人的信仰支柱，甚至將其宗教化、立為「國教」，則是不現實的，尊孔復古的倒車行不通。

2. 佛教沉溺於追求金錢而不能自拔

中國傳統的佛教雖然擁有悠久的歷史、眾多的信眾，但卻存在著各自的局限性。佛教的思想博大精深、典籍卷帙浩繁，但卻缺少通俗易懂可以在大眾中流行的普及本，一般人很難參悟佛道教深奧的教義。僧人道士中學識淵博、精通佛經道藏、造詣深厚的大師寥寥無幾，多數佛道教僧侶忙於應付法事、修廟塑像，有些人甚至不惜以此為名，大肆聚斂錢財，完全置佛教的宗旨與特色於不顧，將宗教變成了生意。以至於佛道兩教表面上雖然金碧輝煌，神聖莊嚴，但其內部卻由於某些敗類混跡其間而難免人欲橫流、銅臭氾濫；在思想上、教義上、信仰上無力佔領制高點，無法大規模地吸引那些受過良好教育、掌握著先進科學、技術、知識與社會資源的各類精英與具有現代民主法治觀念的知識分子。佛道相比，道教的神秘主義色彩與偏重養生練功的特徵，雖然也能吸引一些人，但卻使其在宗教上更為衰落。至於中國的民間宗教與民間信仰則更是重形式、重活動，只在「民間」、草根中流行。它的文化性、娛樂性與反智主義傾向使它遠離神學思辨、遠離理論；它從未試圖從神學、哲學與思想理念上征服形形色色的「讀書人」與上層人士，而

沒有知識精英、政治精英、社會精英的大量介入與參與、沒有源源不斷、「與時俱進」的社會營養與文化營養，佛教不可能從理論上提高、在教義上更新，不可能「現代化」，不可能成為億萬民眾的生活方式的，這是現代社會衝擊下中國傳統宗教與信仰面臨的尚未解決的嚴重問題。

3. 道教因其神秘主義而嚴重脫離社會

道教是中國本土宗教，但道教的教義追求個人成仙。不懂道教，無法傳播道教；懂得了道教，「天機不可洩露」，更不能宣傳道教。道教的神秘主義使其脫離社會，遠離群眾，是中國所有宗教中影響最小、最弱小的宗教。

4. 伊斯蘭教無法在漢族人口中傳播

中國的伊斯蘭教分佈廣袤、根基雄厚，但它只是某些少數民族信仰的宗教，是這些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與文化載體，也是這些少數民族身份與特徵的代表，它們在中國的存在帶有極為明顯的民族與區域特色。比如，伊斯蘭教不允許信徒吃豬肉，但漢族的飲食習慣決定了漢族群眾不可能不吃豬肉。因此伊斯蘭教難以在佔人口90%以上的中國主體民族——漢族中傳播，難以影響中國的主流社會。

5. 羅馬天主教背負沉重的政治包袱

天主教在中國除了背負一般意義上「洋教」的「惡名」，過去曾被嚴重「污名化」外，還受到了兩個特別因素的影響：一是受中梵關係的制約，政治上高度敏感、與政府關係複雜；二是經歷了「梵二會議」後的羅馬天主教雖然做了重大改革，但天主教傳統而嚴格的教義與教規，使其在中國社會的傳播仍然相當困難，尤其難以為當今中國社會的年青人所接受。這兩個因素制約了中國天主教的大面積發展，雖然中國天主教的人數已經從1949年的400萬增加到現在的800萬至1,200萬之眾，但其在中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並無實質性的提高。在中國眾多

的宗教中，它更像一個帶有濃厚歷史印記的特殊群體，而不是一個開放的、與現代社會同步的、生氣蓬勃、面向所有人的大眾宗教。

6. 民間信仰難登大雅之堂

民間信仰是群眾喜聞樂見的信仰形式，但缺乏組織性、缺乏經典、領袖，難以吸引社會精英、知識精英，民間信仰雖然長期流行於草根階層，但難以作為中國社會的主流信仰進入社會上層。

7. 其他新興宗教

外來宗教缺乏影響。東正教、猶太教、摩門教、巴哈伊教等其他外來宗教、新興宗教，人數少、影響弱，社會主流難以認同。

使用上述任何一種信仰體系，都難以解決中國的信仰缺失問題。

三、基督教的優勢

反觀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現有的各種宗教與信仰體系中，儘管目前身處邊緣，但卻有其獨特的優勢。基督教作為人類文明的主要載體之一，產生於中東、發達於歐美、流行於世界，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貢獻毋庸置疑。基督教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或種族的宗教，而是超越時代、地域、民族、種族、國家界限的一個普世性的信仰體系。歷史上，基督教在一個國家是否流行，並不影響這個國家的文化傳統。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可以在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地理位置上差別極大，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各自的國家裏，把基督教作為信仰體系與道德基礎來服務自己的人民與社會。

在神學教義上，通過高度發達的宗教思辨哲學，基督教構建了精緻、龐大而又開放的神學體系。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神學家，不斷地汲取人類歷史上優秀思想家在認識論與本體論方面所做貢獻的精華，對涉及真理、宇宙、生命、靈魂、死亡、救贖、罪惡等一系列人類無法迴避的重大問題，按

照時代的要求，及時地進行論證與回答。經過兩千年來無數神學家的努力，基督教的教義與倫理道德標準發展得相當嚴密、完備，既體現了聖經原則與基督教傳統，又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與極強的普適性。對信仰基督教的個人、民族、國家而言，基督教在作為信仰體系發揮精神支柱的作用方面，卓有成效。

在基督教的傳播上，每個基督教徒都將傳播福音作為自己終生的使命，這種人人主動傳福音的特點，使基督教具有極強的「進攻性」。基督教非常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傳普及基督教的教義與神學思想，文字事工也極為發達，針對不同人群不同需要的各種出版物應有盡有；更重要的，各國基督教都是通過積極推行教會本土化的方式而存在。事實上，基督教得以流行的國家，都是基督教的傳統和聖經原則與本土文化完美結合的結果，基督教傳到了哪裏，就會在哪裏出現具有當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新版本。通過這種方式，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得到了傳播，自身也在不斷地汲取營養、發展壯大。

面對人類遇到的種種挑戰，基督教既講來世，也重今世，同時又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它以個體的生命為關注的焦點，以拯救人的靈魂為要務，重視人的價值、人的需要、人的終極關懷，同時又強調人的原罪、人性的軟弱及人與上帝的關係，強調正義與公正、秩序與敬畏以及末世審判。基督教對人的定位及其基本教義，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目前國際社會普遍公認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都與基督教有著密切的關係。以歐美為首的基督教國家，根據基督教的倫理道德標準與價值觀，制定了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直接間接地影響著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法律體系。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可以反對或批判這套規則，卻無法脫離這套標準另訂出一套。相對伊斯蘭教國家、佛教國家、天主教國家、東正教國家、印度教國家及其他宗教

信仰的國家而言，世界上的基督教國家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方面均處於領先地位。基督教國家是當今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方隊，沒有基督教作為信仰體系與精神支柱，基督教國家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如此顯赫的地位，是絕對不可能的。

基督教的優勢，雖然並沒有在中國社會與中國人中得到認可，甚至許多中國基督徒也不一定完全瞭解，但環顧中國社會的政治與信仰現實，就解決信仰危機的能力與效果而言，還沒有比基督教更好的其他宗教或信仰體系。

基於以上原因，如果中共作為執政黨在今後的一段時期內，仍然拿不出能夠滿足中國人需要的精神產品，解決不了中國人日益嚴重的信仰危機，就會喪失作為中國人道德源泉的官方提供者與道德標準官方維護者的資質，喪失為全社會提供精神信仰產品的主要供應者身份。而中國的其他宗教又無力或無法填補信仰產品供應者缺位元所造成的空白，無法在中國社會、中國民眾最需要精神信仰、最需要解決信仰危機的時刻，提出解決方案。在此情況下，基督教如果能以社會倫理道德與精神信仰產品提供者的身份及時地站出來，擔當為中國社會提供精神信仰產品的大任，為解決中國人的信仰缺失作出貢獻，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當然也包括中國的執政者，就會徹底改變對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可以救中國(道德與文化的重建)，基督教也將因此而得到復興。這就是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性機遇。

四、如何抓住機遇

面對中國社會信仰缺失的危機——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基督教能否抓住這機遇，成為中國社會信仰危機的解決方案，在中國現有的各個宗教、各種信仰的競爭中勝出，就要看基督教能否克服自身的弊端，用恰當的策略，發揮自己獨特的優勢。



1. 定位要明確

中國基督教首先應該明確將自己定位為中國社會信仰體系與精神支柱的供應者、道德標準的制定者與捍衛者，並以此身份佔領倫理道德的制高點，積極主動地承擔和彌補中國人道德缺失的社會責任。這是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中力爭從邊緣向中心移動的大前提，只有從絕大多數人的實際信仰需求出發，為絕大多數人提供可以方便得到的、可信賴的精神信仰產品與滿意的靈性服務，基督教才能在主流社會、主體人口中得到承認，才能真正在中國發揮價值。

2. 主動是關鍵

能否達到這個戰略目標，基督教的主動進取精神極為關鍵。此時此刻，中國基督教不能再等待、再無動於衷了。如果中國基督教此時不能或不願意填補中國信仰缺失造成的真空，不能主動地實現在中國社會從邊緣到中心的轉變，中國人的信仰與精神支柱的危機問題，就只能留待別的宗教、別的信仰體系來填補，去解決。基督教在中國人、中國社會最需要的時刻的缺位元，只能導致自己與上帝為其在中國打開的歷史性的發展之門失諸交臂。

3. 培訓是基礎

中國基督教的目標應該是讓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教會不是私人企業，不是秘密組織，不是傳銷訓練班，也不是逃避社會現實的避風港。教會是基

督徒實踐上帝話語與自己信仰的中心，是樹立信仰、淨化心靈的聖潔之地；是靈魂得救、生命更新的開始之地；是中國社會中最可寶貴的「道德孵化器」與「新人培訓所」，也是練習民主與法治的舞臺。「個人得救」與「作光作鹽」的載體是個人，但其結果卻不僅是為了個人，更是為了教會，為了整個中國。如果一人皈依了基督教，就會被公眾視為是有信仰、有道德、有愛心、守紀律、甘於奉獻、尊重生命、服從法治、清廉公正的「新人」，基督教就在中國社會中成功地建立了「山上的城」，重建了中國人心中的燈塔，基督教就不會繼續停留在社會的邊緣，基督教的影響就會遠遠大於它的信徒數位，這是基督教需要練就的「內功」，是基督教在中國現實處境中戰勝一切競爭者、辦好教會的最佳方式。

4. 管理要跟上

每一間教會、每一位教會的牧者與信徒，都必須認識到中國基督教會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緊迫性與重要性。教會不論大小，都應該在教會內部治理上狠下功夫，進行自我改造，消除中國封建文化與功利主義帶給教會的負面影響。管理教會要靠制度，而不是個人；要改變教會領袖個人負責、個人專權的舊管理模式，建立民主管理監督機制；要把牧師從教會行政管理的繁瑣事務中解放出來，讓牧師專心研讀聖經、提高牧養水準；要把提高主日崇拜與佈道品質作為保證基督教信仰產品的大事來抓。

5. 大門要敞開

基督教中從來不缺少老弱病殘、不缺少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人、不缺少弱勢群體，他們是教會關懷與救助的對象，但教會不能僅僅由這些人組成。要想真正幫助有病有難的弱勢群體，教會本身要有足夠的人材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為此，教會要向全社會開放，向各行各業各階層各領

域各群體人士敞開大門，真心誠意地吸引和歡迎社會上的各類精英人士與專業人員加入教會。社會上大批優秀人員不能加入教會，責任在教會。所以，教會要建立能夠吸引人、留住人的機制。沒有各行各業形形色色的優秀人材加入基督教、獻身基督教，教會的愛是蒼白的，也無從體現；教會在社會上難有作為！

五、基督教的應對之策

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既有外部的阻力，又有內部的挑戰。許多人把教會在中國發展的困難往往簡單地看成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結果；而在外部因素中，又把所謂「政治因素」即「政教關係」看成是最重要的原因，這完全是一種誤判、誤讀。誠然，「政治因素」非常重要，但其變化也最容易；執政黨是否願意調整政策完全取決於其自身的利益，一旦利益需要，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政策。而真正困難的是社會因素的改變，社會因素能否改變取決於大眾的認知與理念，而不是執政黨與政府的政策。即使如此，社會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難改變的是文化因素。歷史上，在政權更替、政黨更迭之後許久，文化因素往往仍然在頑強地發揮作用。因此教會在看待外部的挑戰中，不應該單純把政治因素視為最大的困難，而應把關注的重點放在社會因素特別是文化因素的改變上，把努力消除主流民眾、主流社會與主流文化對基督教的誤解與偏見作為教會事工的戰略目標。

1. 兩個轉變

但基督教能否抓住機遇，基督信仰能否主流化，基督教能否在中國興起，對中國基督教整體而言，取決於基督教自身的本土化程度及相應的兩個轉變：即外部能否從社會的邊緣走向中心，內部能否從封閉走向開放；對基督徒個人而言，取決於基督徒能否真正實踐聖經的教導、成為中國社會的

「光」和「鹽」。與基督教發展的外部阻力相比，教會發展最大的障礙是承認自身的問題，改正自身的問題。基督教要想在中國存在與發展，就必須從改變自身做起，實現兩個轉變：在社會中從邊緣向中心轉變；在教會中從領袖個人負責制的管理模式向民主監督的集體管理模式轉變。沒有這兩個轉變，就沒有中國基督教的未來，這是中國教會發展的大戰略，也是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無法迴避的必由之路。基督教要想抓住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機遇，必須實現這兩個轉變。

2. 許可證

基督教進入中國的許可證不是政府的認可，不是政府的宗教政策，而是中國民眾的認可、中國社會的認可、中國文化的認可。有了民眾、社會、文化的認可，政府的認可是必然的。反之，即使政府承認基督教、支持基督教，沒有主流民眾、主流社會、主體文化的認可，基督教仍然在邊緣。

3. 鑰匙在手裏

基督教被中國社會和民眾接受、認可與信仰的鑰匙在哪裏？是在每一個教會和基督徒的手裏！中國的基督教會、基督教領袖與基督徒應該認清形勢、抓住機遇，在為恢復中國社會的道德基礎、解決中國社會的誠信危機、重建中國人的信仰體系、振興中華文明的過程中，做出自己義不容辭的貢獻。

註：這是2000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廣東省考察時提出的論述，又在2001年7月1日中共建黨80周年大會上提出要貫徹的，指出共產黨要：1.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2.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3.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為北京普世社會科學院研究所所長）